

鄒讜《從傳統權威政治到現代全能主義政治系統》摘要

鄒讜：《從傳統權威政治到現代全能主義政治系統——宏觀分析與微觀分析的結合》，見鄒讜：《二十世紀中國政治：從宏觀歷史與微觀行動角度看》，牛津大學出版社（香港），1994，第204-266頁。

一、引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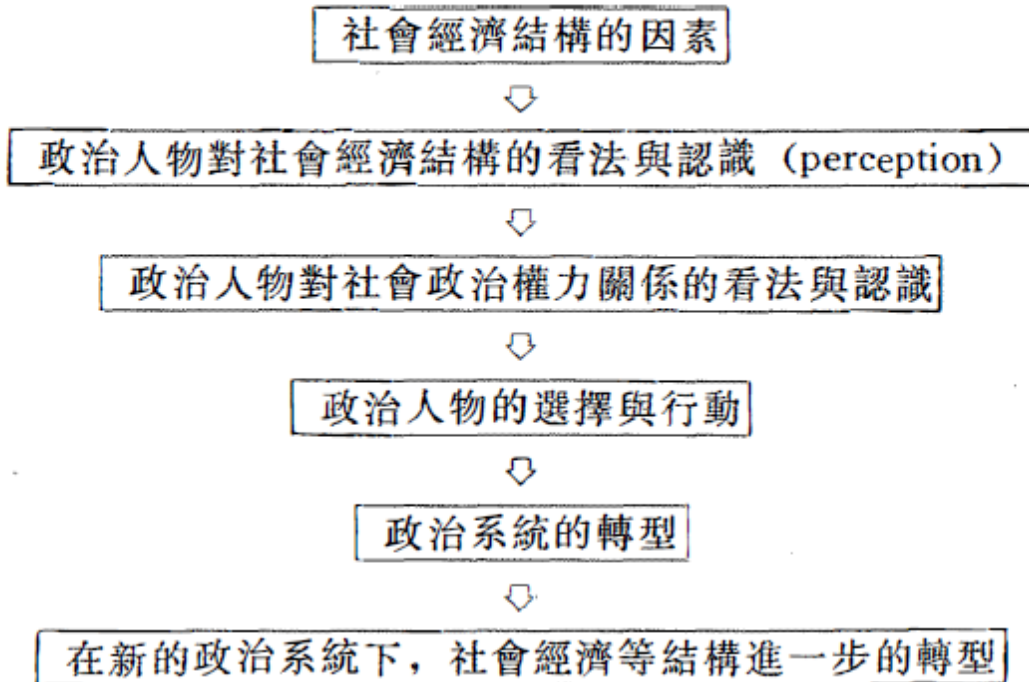
西方社會科學家認為，我們必須為宏觀歷史分析提供微觀的根據，同時也要用宏觀的歷史分析去闡明或烘托出微觀、政治行動的重要意義。但是要完滿地將兩者結合，所用的宏觀歷史分析與圍觀的政治行動分析，必須原來就能彼此適合，並且有基本的共同點。

二、社會經濟的變遷與翻天覆地的政治轉型

中國二十世紀政治的基本特徵是從一個傳統權威主義政治系統（traditional authoritarian political system）轉變為一個現代「全能主義」的政治系統（modern totalistic political system）。我用的「政治系統」（political system）這個概念，包括政權組織（political regime）、政治文化，以及國家與社會關係這三大組成部分。

我們研究的焦點不是某個社會或經濟因素對於政治轉型的影響。毫無疑義，誰都不能忽視這種影響。但是研究的焦點應當是政治行動，是政治行動如何引起政治系統的變化並同時反映這種變化。從政治行動，我們又應當更進一步去分析行動者的理性選擇以及非理性的行為。社會及經濟上的各種因素、各種結構，只能用來說明它們對政治行為的制約和提供的機會。在這個結構性的基礎上，關心政治的人物作出選擇，從事政治活動，改變政治關係、政治結構，運用社會和經濟結構提供的機會，接受它們的制約，改變社會經濟的環境，成立一個新的政治系統，然後又在這個新的政治系統下，進一步的改變社會的經濟的結構。讓我用以下一個示意圖的最簡單的方法說明中國革命政治社會經濟轉型的過程：

從社會經濟結構到政治轉型的示意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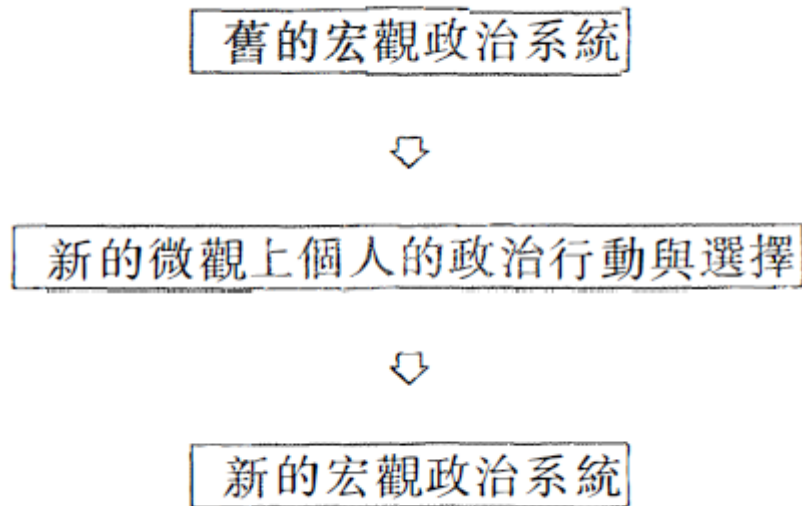
走第二步與走第四步時的「理性」的選擇的過程和結果，就是我們以下第四節中所說的「在社會經濟結構所容許的範圍以內的」理性選擇（parametric rationality）。走第三步與走第四步時的「理性」的選擇的過程和結果，就是以下第五節中所說的「戰略上的理性選擇」（strategic rationality）。

我不同意用經濟、社會、文化等單一的因素去解釋政治系統的蛻變。這種分析方法在基本方法論上是很有問題的，即總是以單一的因素為獨立變量（independent variable），將其他一切現象看成依賴變量（dependent variable），而以前者去解釋後者的變化，很多人從前信服的歷史必然規律，多半是從這個思維方法出發。今日社會科學的發展已告訴我們，人類可以利用已經尋找到的局部性因果關係，去改變社會和社會制度，並且可以改變過去被認為由客觀規律和因果關係所支配而無法控制的行為。

僅就中國而論，我的直覺看法是：中國二十世紀開始（甚至從所謂「資本主義萌芽」開始以來），一直到一九四九年，經濟制度、人的經濟關係，以及經濟水平和發展，雖有一些變遷，但其變化的程度以及速率，決不能直接解釋二十世紀政治翻天覆地的變化。我的感覺并不代表美國學術界的流行看法，但是有一篇數十年來研究中國資料最豐富，方法最嚴謹的論文，在一定程度上支持我的直覺，這是Roy Hofheinz, Jr.在一九六九年發表的文章，題為“The Ecology of Chinese Communist Success: Rural Influence Pattern, 1923-45” [從生態學的觀點看中國共產黨的成功：農村中社會政治力量的影響的格式，1923-45]。Hofheinz用大量數據證明：一般人所着眼的各種經濟、社會、文化的因素，如農村的土地制度，細戶在農村人口中的比例，地方現代化的程度，農民民族意識的高低，都不能單獨的解釋共產黨在整個中國各個環境完全不同的地區的成功或失敗。他所得的結論是共產黨成功最重要的因素是中國共產黨人本身的行為（behavior）。

三、理性選擇論與研究中國革命和政治轉型

我們要分析的是中國宏觀歷史的變化，是中國從傳統權威主義政治轉變成現代全能主義政治的過程，全能主義政治的性質和運作，以及向民主政治轉型的可能。我們要分析這個宏觀歷史變化的微觀基礎。這個微觀的基礎是共產黨人的行爲。共產黨人的行爲是一個相當廣泛的名詞，我們注意的焦點是政治行動和決定政治行動的各種選擇，包括在思想、主義、組織、政策、工作方法、戰略策略的各方面的選擇。這些行動與選擇的結果，經過一段時間就變成了比較穩定的政治制度，政治文化，意識形態，政治共識，行政機構，民間組織，政治與社會的特定的關係等等的結構。這些宏觀結構的總體，它的各個組成部分的互相關係，就是我所說的宏觀政治系統。這宏觀政治系統的基礎是個人的政治行動，宏觀政治系統必然表達於個人的政治行動，個人政治行動是宏觀政治系統的內容。為記憶便利起見，政治歷史變化的過程可以用一個簡單方式表明：



四、社會結構所容許的範圍以內的理性選擇 (parametric rationality)

集體行動與個人行動的關係固然重要，但是歸根結底還是一個個人抉擇的問題。

我們也許可以用極其簡單的說法來表明整個變遷的過程：全面的危機感導致了全面解決所有問題的方案，政治行動者選擇全面解決問題的方案，從事全面性的社會革命，全能主義就在這個革命過程中產生，建國以後更進一步的發展和鞏固，傳統權威主義政治系統遂演變成了現代全能主義政系統。

五、戰略上的理性選擇（strategic rationality）

政治行動者的選擇與行動，不但與社會結構提供的機會與制約，和他們對客觀社會的看法（perception）有關；同樣有關重要的是政治環境；各種政治力量的關係與對比；社會整個政治勢力的均衡；各種戰略策略的運用；以及兩方面或多方面彼此對他方戰略策略的瞭解或誤解的程度。這就是說政治人物的選擇與行動，更直接地受政治鬥爭或競賽的兩方面或多方面的戰略策略互動的影響。這是政治選擇和決策的戰略理性（strategic rationality）。

建國後的各次重大錯誤和失敗，是因為誤解現實，也因為沒有具體的反對力量（如建國前的國民黨）的存在，沒有反對力量的牽制，對政治環境估計錯誤。這是中共一九四九年以後政策激烈化的原因，也可以說是絕對政治權力腐蝕一切的過程。

理性選擇論不僅可以理解中國革命逐漸溫和的趨勢（deradicalization），並且可以用來分析減租減息運動中的地主、農民與中共的行為和它們間的三邊關係。

從這種微觀的分析，我們可以看到中國革命的複雜性：中共並不是只從事階級鬥爭，在農村打倒地主，中共實際上也同時採取階級調協的政策。地主、農民、中共在各個農村中的三角關係，就是統一戰線的實質，所以應當是我們深入研究的對象，研究這個問題最好的理論出發點就是「理性選擇論」和「博弈論」。只有從這種微觀的分析，我們才能真正瞭解，中共如何從無到有，建成一個廣大的幾個階級聯盟，打倒軍事力量雄厚但社會基層力量薄弱的精英分子集團。

我們可以用同樣的方法，即戰略上的選擇與客觀結構所限定範圍內的理性選擇這兩個觀念，去分析一九四九年以後中共各種重大的錯誤和失敗。

六、理性選擇的創新性、系統性與戰略互動性

以上兩節介紹理性選擇論的時候，只是討論到政治行動者面對個別問題，在各種已有的、現成的「可行途徑」（feasible alternatives）中，作出一個選擇。但是理性選擇還有它的創新性、系統性與戰略互動性。創新性是歐美學者明確提出的一個論點；互動性可以從「戰略理性」中引伸出來；系統性則是觀察中國政治而得來的概念，其實它是一般常識，它在現實政治當中表現為政黨或政治家的綱領。

中國革命是否有創新之處，由於各方面政治的干擾，還是個不易解決的問題。在中國有官方的片面的答案，在國外尤其在台灣有相反的分析。我只能提出回答這個問題的二個路向。第一，我們自然必須從中國歷史的觀點，去探索中國革命的創新性。第二，我們必須經常注意，中國革命與法國革命和十月革命的異同。

我們必須指出，毛澤東思想不是一個有新貢獻的純理論與學說。假定我們用研究馬克思、黑格爾、亞里士多德、柏拉圖等人的方法與企望去研究毛澤東的著作，那麼我們就會大失所望。毛澤東著作並沒有站得住的理論上的真正創新。但是我們不能忽視毛澤東思想的重要性、創新性，以及毛澤東思想對馬克思主義的修改和補充。我們可以說，成功的馬克思主義者都是修正主義者。

我三千多年以前就提出一個斷論：「毛澤東思想是從過去的實際行動和決策中發展而來的。它主要是行動與政策之根據的闡述，為行動政策提供正當的理由或自圓其說的解釋。」毛澤東的貢獻不在理論和學說的領域，而是在革命過程中作出不少有決定性的選擇，使中共轉敗為勝。

「毛澤東思想」是中國共產主義運動的行動的結果；是共產黨人的集體對政策的選擇，和選擇政策時的思想，由毛澤東綜合而成的產物。誠然毛澤東的貢獻最大，但是其他人的功勞也不能忽視，不過採用毛澤東思想這個名詞，不但反映了黨內權力結構的變化，並且更進一步的促進黨內權力的變化。

七、全能主義：學術上的名詞，政治上的含義

我在八十年代提出「全能主義」（totalism）這一新名詞來代替美國學術界所通用我也曾一度使用的「極權主義」（totalitarianism）一詞。我以為研究中國政治用「全能主義」比「極權主義」較為合適，其原因有二：

第一，「極權主義」一詞的提出，不僅是學術上發展的結果，並且也與冷戰有關。為了要擺脫「極權主義」與冷戰的關係和避免它政治上的含義，我在八十年代初期就開始用一個新名詞「全能主義」（totalism）來指出一些國家（包括中國在內）的基本特性，這就是：政治權力可以侵人社會的各個領域和個人生活的諸多方面，在原則上它不受法律、思想、道德（包括宗教）的限制。在實際上（有別於原則上）國家侵人社會領域和個人生活的程度或多或少，控制的程度或強或弱。

第二，我的「全能主義」的概念與「極權主義」在理論上、方法上和使用技術上，有幾個不同之點。這些不同之處是出於純粹學術上的考慮。但是我不但不否認並且自動指出：這些學術上的不同提法有它們的政治意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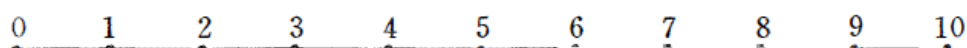
甲、我認為「國家-社會關係」和政治體制是兩個不同的問題，應當分別討論和處理。我用「全能主義」一詞專指國家社會關係的一個形態，而與國家政治體制無關。過去提出「極權主義」概念的學者，一開始就認定兩者有內在的必然關係。因此他們總是把我所謂的「全能主義」的概念和一個特殊的政治制度即獨裁制聯繫在一起。但我所說的「全能主義」和獨裁制度這兩個概念不一定有內在必然的關係，不是這一個概念包括另外一個概念。

將國家-社會關係與權力結構看成兩個不同的現象，有外在的關係而不是一個永遠的一成不變的整體，對學術研究和政治決策上還可以讓我們更明確的提出以下幾點看法：第一，國家-社會關係的變化，在國家開始在一定程度侵入和佔領某些社會領域行使某些功能的時候，常常是因為社會本身，不能有效的提供「公共好處」（public good），不能解決經濟學上所說的外部性（externality）所引起的各種問題，不能最有效的最迅速的建設基礎結構（infrastructure）。第二，國家社會變化並不等於政權結構變化（中國三中全會以後到天安門事件的發生與後果說明這一點），或者我們也可以反過來說，在某種意義上，在某種情況下，國家-社會關係比政權結構更重要，在學術上也是一個更根本的概念。國家-社會關係的變化往往是政體結構改變的原因，並且可能最終引起政治結構的變化。第三，在國家佔領幾乎全部的社會領域的情況下，政治結構只能是獨裁政體。但是國家行使的功能，所產生的效果是好是壞，是提高人民福利還是增加人民痛苦，應當分別研究。某種國家-社會關係的正當性、正義性是應該被肯定的還是被否定的，又是另外一回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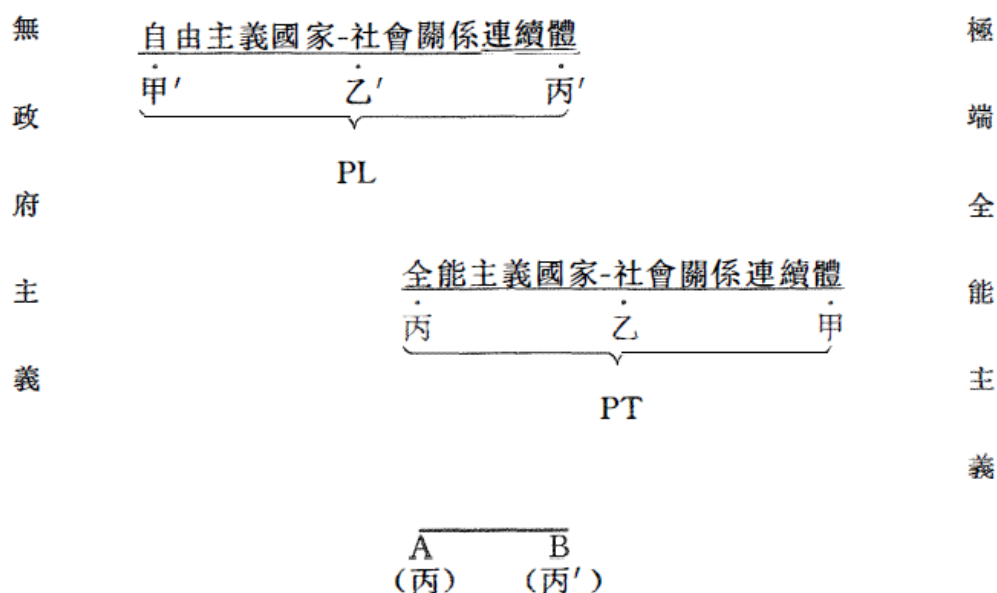
乙、在分別處理：一、國家-社會關係，二、政治制度的兩個問題後，讓我解釋「全能主義」兩個層次上的意義。在第一個層次上，我將全能主義社會與自由主義社會在原則上截然劃分：他們在原則上分界的標準是：國家對社會領域和個人生活的控制，有還是沒有法律上、思想上、道德上，或宗教上的限制。我們可以說，在這一個層次上，「全能主義」和「自由主義」是兩個對立的概念，猶如「極權主義」和「民主自由主義」是兩個對立的概念。在第二層次上，我用「全能主義」一詞去表示事實上國家對社會控制程度的大小強弱。「全能主義」所指的國家，對社會與個人事實上的控制可多可少，可強可弱，時多時少，時強時弱。對某一個社會領域可以非常強烈，同時對另外一個領域非常鬆懈。所以「全能主義」往往是一個程度上的問題，「自由主義」也有一個程度上的問題。在這第二個層次上，我們可以將國家與社會關係看成一個抽象的連續體。

國家—社會關係的兩個示意圖

I 分析國家—社會關係的抽象連續體(continuum)



II 政治思想及實際政治中的國家—社會關係與抽象連續體的對照



PL = 自由主義連續體的任何一點。

PT = 全能主義連續體的任何一點。

說明：I 國家—社會關係的抽象連續體：這個連續體表示國家佔領社會空間的大小和對社會控制的強弱。0 到 10 是大小和強弱的綜合指數。

II 政治思想及實際政治中的國家關係與抽象連續體的對照圖：圖的極左端是無政府主義中所描述的社會，嚴格的說，從

定義上說，國家必有政府，無政府即無國家，所以左極端是代表無國家的社會。右端是極端的極權主義國家下的國家社會關係，現代史上最接近這一極點的是斯大林蘇聯。我認為在自由主義社會中，國家—社會關係是一個連續體，國家控制社會有強弱大小的不同，全能主義社會也是如此。我將代表這兩個連續體的兩條直綫，畫在不同的水平綫上，以顯示這兩種國家制度在原則上的不同。但是這兩條直綫在不同層次上又有重疊之處，以 A—B 亦即丙—丙' 的一綫為代表。換句話說，在理論上和實際上，有些自由主義社會裏，國家所佔領的空間可能比全能主義社會中的國家佔領社會的空間較大，控制力也可以較強。但是這兩個社會中，政策的制定與政治的運轉有原則上的不同。在自由主義社會上，自下而上的關係比較在全能社會中重要，並且這種自下而上的關係的基礎是社會團體的獨立性、自主權和人民享有國家不能侵犯的權力。

■ 政治統治轉型困難的示意點綫：甲乙丙代表某一國家在全能主義連續體的位置，國家對社會的控制， $甲 > 乙 > 丙$ 。甲'，乙'，丙' 代表某一國家在自由主義連續體的位置， $甲' < 乙' < 丙'$ 。國家社會關係轉型和政治系統轉型的困難度：從甲到甲'，非常困難，簡直不可思議；從乙到乙' 就較容易，可能性也大；從丙到丙' 理論上有可能性，但實際上不易出現。這就是說，假如我們用 PT 代表某一個國家在某一個時刻在全能主義連續綫上的任何一個位置，用 PL 代表同一個國家在另一個時刻在自由主義連續綫上的任何一個位置，PT 與 PL 距離越遠，從全能主義的國家社會形式轉型為自由主義的國家社會的形式就越困難；距離越短，轉型越容易。從政治學的觀點看，「休克治療法」的一個特徵是 PT 與 PL 的距離很大，並且要很快的從 PT 這一點，移動到 PL 這一點。PT 到 PL 的距離的大小，可以代表「休克」的大小。除了轉型的困難度以外，這個示意圖也代表一個假定：從全能主義國家社會轉變為自由主義的國家社

會，在這轉型後的國家社會，國家應當佔領社會相當大的一部分空間。將PT到PL兩點的距離逐漸縮小的方法，比一步登天的方法，容易成功，民衆比較容易承受和適應前一種的變革，國家—社會關係轉變的好處也比較容易顯示出，自力更生的可能也大，中國1978年以後與蘇聯—俄國1989年以來的經濟政治發展的鮮明對比就是一個例子。政治活動者的綱領，應當注意到這一點。

八、全面危機，社會革命，全能主義：一個提綱性的初步解釋

中國全能主義的淵源長遠深厚，並且經過長期和複雜的發展過程。

中國在十九、二十世紀，受到外來思想、文化、經濟、政治、外交和軍事力量的衝擊，加強了原有的社會、經濟、政治發展中的矛盾。各個領域，都發生新的問題，舊的問題也以新的形式出現。中國傳統制度與方法，均不能應付和解決這些問題。究竟這些問題是如何嚴重與迫切，還值得重新研究。但是重要的是：社會的精英分子，尤其是知識分子和政治行動家，對這些問題的看法、估計、認識和瞭解。他們有的人認為某個特殊領域，有嚴重危機；而另一些人認為另一個領域中，問題更多。有些人認為這些危機並不迫切，可以慢慢的一個一個的去解決，但是另外一些人認為中國面臨一個全面危機，各個領域中的個別危機構成一個整體，這個全面的危機必須全面解決，盡快解決，解決的方法是社會革命，社會革命必然是全面的。革命的力量必須侵入進駐控制社會的各個領域。在克服全面危機的同時，也解決各個領域中的危機，而解決各個領域的危機，又是克服全面危機的方法。於是全能主義的國家，在漫長的革命過程中逐步成長，用最簡單的方式表達：

全面危機——社會革命——全能主義的國家社會

中國全面危機的中心不是經濟制度的崩潰，不是經濟階級的變化，不是人口的增長，不是社會制度的衰敗，而是政治領域中的危機。傳統國家解體，統治階層失去正當性，政府癱瘓。這個轉變中最重要關鍵是知識分子政治活動家接受馬克思主義，建立新的關係網，組織列寧主義政黨。這個政黨從事社會革命，在中國特殊的革命情況下，組織軍隊，設立政權、行政機構，建成一個在國家中的國家。起初是謀生存，以後是爲了爭取勝利，這個政黨必須深入民間社會，發動組織群眾，進行土地革命，改變地主與農民關係。革命過程中，因客觀環境與戰略關係，對社會的控制還受到一定的約束。爲了抗戰以及對付軍事力量強大的國民黨，中共必須集中它所能控制的社會力量。全國勝利後，黨—國家佔領社會空間越來越多，在一九五七年這個原則變成一個單

一的口號：「工、農、商、學、兵、政黨，這七方面，黨是領導一切。」這個國家控制社會的趨勢一直到一九七八年三中全會，才有所改變。

中共的危機感，在建國以後並沒有消失，它對國際上的危機估計過高，因此反應也過份。在三中全會以後，中共危機感仍然在領導人心中存在。「亡黨亡國」一詞仍然在重要時刻出現。

九、天安門事件的分析：從宏觀結構到微觀個人選擇與行動的兩條綫索

第一條綫索從全能主義的國家-社會關係，聯繫到最底層人民大眾的行動，並說明宏觀國家社會結構和思想上作風上的兩個因素，如何促成僵局與最後的決裂，這條綫索有以下的個起點和幾個關節與機制：

一、起點是傳統權威主義下的國家-社會關係。

二、在全能政治系統中，列寧主義政黨的正式組織和機構一直侵入，滲透社會各個領域和人民的日常生活，幾乎佔領社會整個空間。黨領導一切。

三、黨在社會各部門及人民生活圈子內，建立各種機構去領導和控制民間社會及基層社會。

四、從一九七八年的三中全會到天安門事件的前夕，中國民間社會與民間政治社會有一定程度的變化，黨國的控制放鬆，民間社會與民間政治社會裏的團體，活動範圍擴大，獨立性稍有增加。

五、民運發生，最開始時基本上是自發性的行動，由各式各樣的人際網絡去支持。民運擴大，這些人際網絡逐漸聯合形成各校的自治學生會。各校間的自治學生會，以後更聯合成全市性的組織。這些獨立的學生會從官方組織的學生會手中，奪取了領導權，要求官方承認為正式代表學生的團體。

六、黨和政府如果正式承認這些團體，不但被認為出賣了原來官方承認的學生組織，並且破壞了整個制度的基礎，在其他社會領域內，也就會有自發的組織，要求黨和政府承認它們的地位。

七、學生堅持政府承認自治組織，政府拒絕這個要求，因此做成一個僵局。

八、學生與民運必須設法打破這個僵局，因為如果僵局發展為決戰，其結果必然是政府以強大的軍事力量，鎮壓民運。民運最重要的致命的決定是堅守天安門到底，絕不撤退。這個決定不是偶然的選擇，而是學運發展的結果。

九、政府與民運僵局發展的結果是決戰不是和解妥協，民運全部破產，政府也蒙受嚴重的損失，尤其是國際上的形象大受損害，與美國貿易關係動搖。造成這個結果有幾個傳統思想上的原因。第一個是在政治問題上，堅持原則，忽視實際的作風。另一個是中國二十世紀以來、關於最基本的政治問題和在最高層政治鬥爭的格式是一個「全贏全輸」的局面。全贏全輸的看法，有一個更深的根源，這就是最高政治權力是單一的、不可分割的思想。

分析天安門事件的第二條線索，是討論宏觀政治結構如何限制中共內主張與民運妥協的領袖的行動，如何排除一些理論上可行的方案，使他們不能採取戰勝保守分子的戰略與策略。這條線索比較第一條線索具體，也是一般人比較熟悉的。但是我們要真正瞭解這條線索的重要性，就必須用社會科學上的「反事實的論點」（counterfactual argument），去評價事實上所採取的方案，指出一條理論上可行的而不被採用的途徑。

黨的權力制度、組織形式、行動準則以及各種機制，控制着趙的選擇決定和行動。與其說趙本人軟弱，不如說黨的控制的嚴密。趙紫陽深深體會到這些控制的力量。因此讓人家覺得他是軟弱的領袖。假如當時的民運分子，體會到趙紫陽的處境，知道他已經在可能的範圍內，作了最大的努力，真正瞭解閻明復懇求學生的話（閻明復對民運領袖說假如你們認為黨內有改革派，希望你們給我們一些時間）背後的政治意義，並且知道唯一可以挽救當時局面從長期中取得改革的勝利的途徑是與中共中的改良者的非正式群體建立不言而喻的共同進退的在戰略策略上的行動，假如能夠這樣做，天安門悲劇可以避免，中國政治可以按照天安門事件前的方向，繼續並且更迅速的前進，這是我們從一個「反事實的論點」所引進的具體教訓。

十、歷史的變化與延續

傳統國家社會中的權威關係和現代國家社會中的權威關係兩個基本不同之特點：第一，即使我們假定傳統社會中的個別權威關係，以及近代社會中的個別權威關係完全相同，但是在傳統國家社會中，這種權威關係，只存在於某些社會領域中。與此相反，在現代全能主義國家社會中，這種權威關係，幾乎普遍存在於每一個社會領域。第二，在傳統社會中，各個個別的權威關係，例如師父與徒弟的關係和皇帝與大臣的關係，沒有組織上的聯繫，只有意識形態上相同之點，也許可以說是淵源於同一統治階層的共同利益和需要。在現代全能主義國家社會中，各個個別領域中的權威關係，經過政黨和政府的組織，連成一個完整的遍蓋全社會的網絡。雖然在實際運用上，這個網絡有很多漏洞，有很多弱小的環節，但是歷史的變化就在這個網絡的形式上產生與發展。

我的框架以五對名詞組成：

一、「整體」和「構成部分」（whole and part）。在現代全能主義國家社會中，各個部門中的權威關係，可能基本沒有改變（譬如勞力操作者與使用勞力的人的權威關係沒有改變），但是整個權威系統，整個國家社會系統（the social-political system as a whole）是改變了。就算我們承認在傳統社會裏，各個領域的權威關係都是一樣的，各個領域擁有權力的人都是同一統治階層的成員，我們也必須指出他們之間沒有一個整體的聯繫機構、權力機構和組織機構，他們不是一個有組織的、有決定權的、全面的機構的成員，所以我們認為：雖然每個領域中的權威關係沒有變化，但是權威系統本身和整個國家社會的系統發生了重大的變化，這個有組織的權威系統，遍蓋所有社會的領域，它的權力能量（capability of political power）也大為增加。而且，這些權威關係，和整個權威結構本身也不是全無變化。在現代全能主義國家社會中，自下而上的渠道增加了，自

下而上的對政治與政策的輸入（input）也比以前重要。某一特殊的構成部分雖然在本質上沒有變化，但是由於整體發生了變化，它的意義和運作也大有不同。假如這個分析是正確的話，我們可以作如下的預測：全面危機過去了，不僅目前的國家-社會關係又要發生變化，在一個較長的時期後，權威關係與權威系統也要發生一定的變化。

二、「目標」與「手段」。三中全會以來，中共瞭解政治手段不能解決經濟問題，所以從某此經濟領域撤出，由市場機制去控制，但是這種政策上的改變，手段的變更本身就是有意識的一個基本政治決定。

三、「內容」與「形式」。現代中國全能主義政治系統的意識形態是以十九、二十世紀的馬列主義為基礎，與傳統的意識形態的內容截然不同。但是馬列主義與中國文化思想傳統中的「一元的」、「整體的」和「理智化的」思維方法是一致的。內容改變而形式仍然有延續性。毛澤東思想是反傳統的思想，但是也繼承了馬列主義與中國文化傳統中的「一元的和理智化的」思維方式。

四、「價值觀念」（value）和「作風」。中國政治總體中的價值觀念是「普遍性的觀念」主義的成份，如「平等」，「自由」，「各盡所能，各取所值」等等。但是實際的政治作風與工作方法是「特殊性的」（particularistic），並保留了中國傳統中從小單位如家庭、親屬、宗族、鄉鄰、村落等而來的超於個人的社團觀念（community consciousness）。

五、Explicit Orientation and Implicit Support。這對名詞不易用中文表達，只有說是「顯然可見的定向」和「隱藏在內的支持」。中國當代的「顯然可見」的定向是經濟發展，是「唯物主義」，是追求生活水平的提高，是建設現代化的社會。隱藏在內的消極的一方面的支持，是薄弱的宗教思想（缺乏人世與超驗界的緊張關係）。積極方面的支持是傳統儒士與一般民眾的思想。

在解釋上述五對名詞時所用的實例中，有關變化的事物，大半屬於整體、目標、內容、價值觀念和「顯然可見的定向」的一些範疇，有關延續的事物，大半屬於部分、手段、形式、作風和隱藏在內的範疇。不過上述實例中沒有提到中國政治文化中一個極端重要的延續不變的思想和實踐，用我們的名詞來分析，這個思想和實踐是政治系統的整體的一個基本原則，一個在整體中的最高層政治最有決定性的政治活動的基本「遊戲規則」（rule of the game）。我用「全贏或全輸」這個名詞去概括這個政治最高層的遊戲規則。這個規則有三種可能的式樣：

第一個最嚴格的式樣（the strong version）是：兩方面都很明顯地要全贏，都怕全輸。

第二個比較寬鬆的式樣是：事實上只有一方面要全贏，另一方面怕全輸。

第三個最寬鬆的式樣（the weak version）是兩方面事實上並不要求在目前情況下得到全贏的結果，但是兩方面或至少一方面害怕對方最終要達到全贏的目的，因此只能在一定範圍內作出讓步，以防止對方達到最終全贏的目標。結果，雙方彼此的猜疑，將政治軍事鬥爭推到一個全贏全輸的局面。

這個「遊戲規則」淵源於一個更基本的觀念，這就是最高政治權力是單一的、不能分割的；並且權力的「邊緣利用價值」（marginal utility）永遠在增長；權力越大，越可以爭取更多的權力，並且政治力量的運用是毫無限制的，政治權力是戰無不勝的，即西方所指的omnipotence of power。這個基本原則在決戰時是顯然可見的規律，在平時日常政治中是一個隱藏在內的、心照不宣的道理，它是政治家的目標，至少是從手段變質而成的目標；它又是價值觀念，至少是從作風

變質而成的價值觀念；它既決定鬥爭的內容又是的形式。這個鬥爭的形式和思想上的根源是中國千年歷史流毒最深、遺害最大的傳統。